

# 第一章 华侨出国史与经济

当提出东南亚华人经济问题来加以考察的时候，首先有必要弄清东南亚华人甚至世界华人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有必要追源溯流，先考察一下以东南亚华人为主的世界华人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华侨、华人成为世界现象的经济因素。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中国与外国，中华民族与海外民族，从很早的时候就发生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往，中国人移居国外就是在这种频繁交流的历史过程中出现的移民现象，因此，中国人移居国外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

据史册记载，秦汉时代，中国人已远航国外；唐宋时代，中国人已侨居十数国；元明时期，中国人向海外移居的人数日益增多；到了近代，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到海外谋生的劳动人民更形成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今天的华人、华侨已达 3 000 万人，遍布世界五大洲，在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留有他们的足迹。那么，华侨和华人到底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

## 第一节 古代华侨出国与经济

### 一、唐朝以前对外交通和贸易的发展与早期中国人出国

中国人移居国外，首先是与中外交通（特别是航海）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也是在中国与外国的政治、贸易往来基础上开始的。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封建集权的统一大国。“千古

一帝”秦始皇开发岭南，设置郡县，从那时起，广东的雷州半岛以西，至安南（现越南）的东京湾一带，即成为中国人航海南行的基地。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还派方士徐市（又称徐福）带领数千童男童女泛海东渡，去寻求长生不死的仙药。据《史记》记载，这种大规模的航海费钱“巨万”，费时“数岁”，结果自然是一枕黄粱，不但没得到神药，连徐福本人也流居在“平源广泽”而未归！有的学者认为“平源广泽”就是日本或菲律宾，也有人认为是台湾或者琉球。日本史书如《神皇正统记》也有徐福到了日本的传说记载，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建有徐福祠、徐福墓；菲律宾学者也认为，在公历纪元前，中国的周秦时代，中菲之间已开始交通往来<sup>2</sup>。徐福航海究竟到了何处尚无定论，不过可以看出我国在秦代时已能进行一定规模的航海了，也反映出秦时已有中国移民成批移居日本的事实。

西汉时代，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经济繁荣稳定，疆域不断扩大，到汉武帝时已是国势强大的极盛阶段。这时，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也频繁起来，中外交通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公元前 138~前 119 年，汉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汉时的西域，通常指我国的新疆地区，广义也包括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西亚、欧洲一带<sup>3</sup>。第一次，张骞的探险队越过天山、葱岭，经过大宛（中亚的费尔干纳）、康居（中亚的撒马尔罕）到了大月氏（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第二次张骞再次出使西域时，他的副使曾远达安息（波斯，现伊朗）、条支（今伊拉克一带）。两次出使的结果，加强了西域地区和中国内地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沟通了我国与中亚、西亚甚至欧洲的友好往来，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从这一时期逐渐形成起来的。从此后千余年间，我国与中亚、西亚的交通畅通无阻，中国丝绸等著名特产源源运往中亚、西亚，然后转运到欧洲。而西方的物产也通过这条丝绸之路不断传入中国，“殊方异物，四面而至”，给中国增加了新财富。丝绸之路堪称是中外友好往来之路，

经济文化交流之路。那么，在汉代频繁的对外交往中，有没有中国人移居到外国去谋生，成为最早的华侨呢？中国史籍中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记载，但亚美尼亚的历史学家摩西，在公元 5 世纪中叶，曾在他的名著《史记》中谈到，早在公元前 1 世纪时，曾有数队外国移民投奔到亚美尼亚，内有很多中国人，而且指出亚美尼亚的名门望族，许多人也具有中国人的血统<sup>4</sup>。在中西陆路交通贸易已经通畅的汉代，中国人沿着这条丝绸之路移向中亚或者更远的地方进行贸易，以至长期定居外国，也是可能的事情。当然，仅根据这条记载还不能断定汉代已有华侨出现。中国的海上贸易和交通，在西汉时也有相当发展，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这个时期，开辟了历史上空前的长距离海上航线，中国的商船曾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合浦县）等地出发沿着南中国海南行，到了都元国、邑卢没国、谶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已程不国的海岸，在海上航行达数月之久<sup>5</sup>。据有的学者研究，认为这些古国分别是现今的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等地方，总之，汉代商船南行把中国的“黄金杂缯”带给了东南亚，把东南亚的明珠、壁琉璃、奇石异物带回了中国。当然，记载是简单的，而且有些古地名尚待考证研究，但是汉代的人已远航到了南洋和印度，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两汉时代，中日之间的海上交通有了较大发展。公元前 108 年（汉元封三年）汉武帝在朝鲜设置乐浪、临屯、玄兔、真番四郡，中日之间对渡朝鲜海峡的航行日趋频繁，大批中国移民取道朝鲜半岛渡海到日本。他们带去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开发做出过历史贡献。而日本岛上的一些小国也积极与中国往来，吸收先进文明的华夏文化。东汉光武帝时，日本倭国已正式与中国通使，1784 年日本博多湾志贺岛发现刻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就是公元 57 年（汉建武中元二年）汉光武帝对倭国王遣使朝贡所赐封的印绶。

三国时代，吴国的孙权想扬威海外，于公元 226 年派遣朱应、

康泰出使扶南国（现柬埔寨），康泰所乘的船舶沿着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出马六甲海峡，一直航行到印度、波斯湾各地，所经历及传闻凡百数十国，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获得了很大成功。他们回国后，写了《吴国外国传》和《扶南异物志》，介绍海外国家的风土人情，扩大了古代中国人的眼界，丰富了人们对于南洋各国的知识，促进了中外的互相交往，但可惜的是这些书经过历代动乱已经佚失。

最早到达东南亚和印度的中国人中，也有往西天求法的僧侣。晋代和尚法显曾到印度求佛经，他于公元 399 年自长安出发，路经西域，入天竺；返回时走海路，从狮子国（斯里兰卡）横渡印度洋到爪哇，然后附商船回到中国，法显途经 30 余国，前后凡 40 年，回国后写有《佛国记》，记叙他经历诸国的见闻，这是研究西域和印度历史、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一部极重要的著作。此后，由海陆两路往印度取经的高僧，络绎不绝。

隋朝是一个短暂的朝代，但对外关系并未停止发展。公元 608 年，隋炀帝遣派常骏、王君政出使赤土国，即现在泰国南部地方，受到热烈欢迎。赤土国王并命王子携带文书和金芙蓉冠、龙脑香等礼物随船回访中国。隋代时日本与中国也互派使者往来，此时并有许多日本僧人到中国学习佛法。

综上所述，自秦汉到隋代，我国通过陆路与西域国家发生了密切联系，通过海路与南洋、印度和日本也有了一定的交往，这些早期的对外贸易和交通的发达，为唐宋时代中国人民移居海外创造了前提条件和基础。

## 二、唐宋时期华侨的开始出现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繁荣强盛的大朝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具有高度文明著称的国家。唐太宗李世民采用宰相魏征关于“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致力于内政的改善，使得唐朝前期国内政治统一，对外不断获得胜利。到唐玄宗时，对外关系发展

到了顶点，我国与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非常频繁，特别是对外贸易有了空前的发展。当时，从丝绸之路来到河西诸郡（甘肃西部）进行贸易的国家有 40 余个，唐德宗时居留在西安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达到 4 000 余家；中国商人沿着丝绸之路往西亚、印度进行贸易的也络绎于途。而海上贸易更是盛极一时，中国和外国航行于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的商船数以千计。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大量东来，甚至在中国沿海主要港口建立名为“蕃坊”的定居点。广州是对外通商的最大港口，居住在这里从事贸易的外国人有十几万之多，唐朝政府设有市舶使专门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唐朝中期以后，中国航海事业已颇为发达，至唐末，中国远航船只形体巨伟，结构牢固，载重量大，抗风浪能力强，设备也很齐全，已超过了当时任何外国船舶，因此，“唐末五代间，阿拉伯商人东航者，皆乘中国船”<sup>6</sup>。据记载，当时中国的远洋航船不仅北至渤海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而且航迹遍及东南亚、南亚、阿拉伯湾和波斯湾沿岸，甚至首次到了红海与东非水域，呈现唐代远洋航海的繁荣景象。

随着对外交通和贸易的发展，中外交往频繁，从唐朝开始，便有极少数中国人旅居国外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他们可以说是最早期的华侨。海外中国人之所以长期有“唐人”之称，与强大的唐朝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唐代中国人移居国外是有关系的。宋代朱或在《萍洲可谈》这本书中解释说：“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唐代移居国外的华侨，主要是分布在西域国家、南洋群岛和日本，如前所述，这些地区在唐朝时与我国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唐天宝十年（公元 751 年）唐与大食国（在阿拉伯半岛）发生战争，唐人杜环被俘，到了西海（地中海）一带，10 余年后释放回国，著有《经行记》一书。据杜环记载，当时大食国有“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环、吕礼”<sup>7</sup>。又据阿拉伯人记载，唐代的中國商船经南洋、印度至波斯湾

贸易，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口末罗国，有许多中国人居留地，而且子孙繁衍。可见移居在此已有几代人了。在阿拉伯的亚丁，也有中国人居留地<sup>8</sup>。唐代，南洋群岛的苏门答腊、菲律宾也有中国人移居。公元 10 世纪时，阿拉伯人马素提曾游历非洲、南亚、南洋群岛入中国，著有《黄金牧地》一书。书中记述他在公元 943 年经过苏门答腊的三佛齐时，看见“有多数中国人耕植于此岛，而尤以巴邻旁（室利佛逝）为多，盖避中国黄巢之乱而至者”<sup>9</sup>。这就是说，唐末时期已有不少中国人为躲避战乱而移居到苏门答腊。在菲律宾的一些地方，曾发掘大量的唐代古钱币和陶瓷器，甚至还发现过唐代中国古墓，说明当时可能已有中国人在菲律宾定居<sup>10</sup>。唐代中日交流尤为频繁，日本为了吸取中国文化，派遣大批使者、留学生和僧人到长安等地学习，据统计，唐朝近 300 年的历史中，遣唐使的任命计 18 次，每次人数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中国学者、僧人东渡日本传经者也不在少数，唐船经常到日本，仅见于记载的就多至数十次，而且在日本造船和驾船的也都是唐人。在这种大规模频繁交往中，有不少中国人移居日本，如日本圣武天皇时（唐玄宗十二年至天宝七年），居住在日本京畿的华侨（秦人）就有 1 200 多家<sup>11</sup>。还有一些自隋代起就移居到日本的商人，已传数代，逐渐与日本人同化了。

公元 10 世纪兴起的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大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宋朝的手工业和商业比唐朝更加兴盛，海上交通更为发达。中国船独步于南中国海、印度洋和波斯湾，无论是容量、设备，还是船上组织的严密程度，都远胜于同时代的外国“番舶”。公元 11 世纪末至 12 世纪初，宋代海舶已知道利用罗盘辨别方向<sup>12</sup>，这种技术后来又经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宋朝航海技术的这一突出成就，是对世界航海事业的重大贡献。航海技术的重大进步再加上宋朝政府采取的奖励政策，促使宋代对外贸易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宋代在广州、泉州、杭州设置了市舶司机构，管理繁盛的对外贸易。泉州在南宋时已是非常繁盛的国际贸

易港口，泉州提举市舶使赵汝适从一些到泉州来交易的外国人的口述中，集成了著名的《诸蕃志》一书。书中记载有东自日本、西至地中海西西里岛的 35 个国家，略述各国的风土人物，详载其入贡中国的年代，和中国交易的情形，同时又记录了以泉州为出发点，到达各国的航路和航行日程等等。从《诸蕃志》一书的写成和内容，就可以看出当时泉州港的繁荣，来做买卖的外国人的众多。同时代的周去非，写了《岭外代答》，记录南洋各国情形和各国来中国通商的航路，都颇为详细。

宋代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客观上增加了商人及其他人员出国旅居的机会，因而中国人侨居海外的人数和地区也增多了。到南洋各岛进行贸易的中国帆船，冬春之间靠东北信风鼓帆而去，夏秋间又借西南信风之力扬帆归来，中国商人运载出去丝织品、茶叶、瓷器、五金、杂货，换回来的是香料、药材、檀香木等土特产品。由于要等待季风才能返航，所以逐渐有商人在当地住下来，开始多是季节性的暂住，后来由于贸易的发展，需要大量收购当地货物，所以有人专门从事这些交易，于是出现了长期居住在该地的中国商贾。朱或《萍洲可谈》卷二记述：“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并提到有的中国商人“住蕃虽十年不归”，这是中国商人从“行商”过渡到“住商”的生动记载。宋洪迈《夷坚志》卷三记载，泉州人王元懋“遂主舶舫贸易、其富不费，”淳熙五年（1178 年），使行钱吴大作纲首，凡火长之属，而图帐者三十八人同舟泛洋，一去十载。”另外，宋朝的文献中，还有“过海入蕃”的中国人在国外居住 20 年以至“娶妻养子”的记载<sup>13</sup>。很清楚，宋代已有商人为了经营的需要而长期居住国外。唐宋两代航海技术的进步和对外贸易的发达在华侨发展史上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宋代华侨的侨居地主要集中在南洋一些地方和日本。《宋史》卷四八九阇婆国（爪哇）传记述，当时“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渤泥（婆罗洲）则“尤敬爱唐人，醉则扶之以归

歇处”<sup>14</sup> 苏吉丹( 阇婆支国 ) 厚遇商贾, 无宿泊饮食之费”<sup>15</sup>, 可见华侨与当地民族友好融洽的关系。宋代时候, 马来半岛也有华侨的足迹, 颜斯综《南洋蠡测》记载: “新忌利坡( 新加坡) 有唐人坟墓, 记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 柬埔寨有定居多年的温州人<sup>16</sup>。中国商人也经常往来于中日之间, 北宋时, 日本把中国商人安置于鸿胪馆, 供给饮食; 日本一条帝长德元年( 公元 995 年), 中国商人 70 人到若狭, 命移住越前国<sup>17</sup>。南宋以后, 日本奖励中日之间的贸易, 在摄津福原筑别庄, 招待中国侨商。

除经商而侨居到外国的中国人外, 南宋末年, 也有部分不愿臣服元朝统治的人到海外政治避难, 最后终老在异乡。他们是宋代海外华侨的组成部分。郑所南《心史·大义叙略》记载 1279 年南宋在崖山惨败后, “曾渊子等诸文武臣流离海外, 或仕占城, 或媾交趾, 或别流远国。”南宋宰相陈宜中也是“别流远国”的中国人, 他曾经到占城( 今越南中南部) 求救兵企图复南宋之国, 后来又逃到湄南河上游的暹国, 一直住到老死; 像这样“别流远国”的人还很多, 例如广东东莞人李竹隐, 在反抗元兵南侵失败后, 渡海到日本, 教授诗书, “日本人多被其化, 称曰夫子”。<sup>18</sup>

### 三、元至明朝中期华侨在东南亚的广泛分布

元明两代( 公元 1271~1644 年), 对外交通和贸易都比较发达 元代武功超轶前代;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远征军东到朝鲜, 西到欧洲, 北及北冰洋, 南到印度洋, 这就在客观上沟通了中西诸国的联系, 推动了中国的对外交流。元代对外的陆路贸易, 天山南北二路商道重新开通; 海上贸易在元朝政府的鼓励下也得到大规模的发展。泉州、广州、温州、宁波、上海、澈浦等 7 个城市都曾开放为对外贸易的港口, 设有市舶司专管与外国商人的交易。泉州港在元朝发展到鼎盛阶段, “风樯鳞集, 舶计骤增”, 旅行家马可·波罗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sup>19</sup>。元代的海上交通也有进一步发展, 元政府以国库金造船, 通商海外。这时阿拉

伯人的海洋航运已逐渐衰退，到了 14 世纪前期，印度洋上的航运已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往来于中、印之间的船舶几乎完全是中国船了。明朝初年 郑和下西洋成为震动中外的壮举。郑和自 1405~1433 年 7 次率领船队出使“西洋”前后 29 年，遍历今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南洋群岛、印度、波斯、红海以及非洲东部。郑和下西洋据说是为了寻找被明成祖夺去皇位的建文帝，但实际上也是封建王朝经营的对外贸易。郑和率领的宝船队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巨舶数十艘，随行人员数万人，携带大量金银、缎匹、瓷器、宝钞等，所到各国进行通商互市，换回当地各种物产、名为“取宝”。郑和的船队所到之处，也调查了华侨社会和村落，以及调停海外中国人纠纷和讨伐海盗。郑和与他的随行者们通过多次远航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编写了航海地图和航海手册。无疑，元朝以来至明朝初期，对外贸易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为中国人移居国外特别是移居到南洋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因此，华侨在这一时期已广泛分布到南洋各地。

与唐宋时代相比，这一时期的华侨有如下特点：第一，出现了中国人成批出国的现象。华侨人数显著增加，但多数是商人；第二，华侨居住地增多，已广泛地分布于南洋各地，而且在南洋一些地方进行了开发 以至出现了由华侨移民组成的“新村”第三，华侨与当地妇女通婚成为普遍现象，或者信仰当地宗教，从而开始了与当地民族进行融合的自然过程。

苏门答腊和爪哇在宋代时期已有华侨移居，到这一时期华侨的情况有了很大发展。爪哇在元明之际成为雄视南洋的大国，婆罗洲、苏门答腊岛上诸国已归属于它。元代，爪哇岛上已有许多广东、漳泉人流寓在此地居住。明代，随同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写的《瀛涯胜览》和明代史书对移居爪哇的华侨记述颇多。《瀛涯胜览》说当时的爪哇国有四处要地，即杜板、新村（廝村）、苏鲁马益和国王居住的满者伯夷，而这 4 个地方都有许多中国人在那里定居。满者伯夷“国有三等人，一等回回，皆是西番流落此地……”

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此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sup>920</sup>。苏鲁马益，又称苏儿把牙（即今泗水）是一个“货商舶米粮”的热闹港口，港旁大洲林木蔚茂，千余家，强半是中国人<sup>921</sup>。苏鲁马益北 20 余里就是新村（厮村），为中国人所开创，过去曾是沙滩之地，“中国人客此而成聚落，遂名新村”，村主是广东人，侨居的中国人达到几千家<sup>22</sup>。杜板番名赌班，“此地约千余家以上”，“其间多有中国广东漳州人流居此地”<sup>923</sup>。苏门答腊的巨港，在元明时期“其国之人，多广东漳泉人移居此地”。巨港在宋代时叫巴邻旁，在元代称旧港，所以改用此名，是因为自元以后，华侨到爪哇的逐渐增多，于是称爪哇的移居地为新村，而改称巴邻旁为旧港，以示区别。显然，这些名称都是出自华侨之口。明代时候，华侨在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国也有相当势力，“有梁道明者，雄视一方”<sup>924</sup>。在 16 世纪末荷兰殖民主义者入侵印尼群岛之前，爪哇岛上的杜板、锦石、泗水、万丹等地还曾是中国人聚居的贸易中心，此外，还有中国移民在贸易口岸附近种植水稻和胡椒，制造砂糖。

婆罗洲在元明时代也有华侨移居。勾栏山（在今加里曼丹）在明初已是“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之”<sup>925</sup>；据传郑和下西洋曾到婆罗洲，华侨随之移殖者甚多。明万历年间，“有闽人某，曾三其国。相传即从郑和南移华侨之后裔也”。加里曼南部的文郎马神（今马辰），在明代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十分密切，中国瓷器深受当地人民欢迎，华侨在此经商者日众。据记载，华侨要严格遵守当地规矩，“华人与夷女通，辄削其发，以女妻之，不听归也”<sup>926</sup>。

中南半岛的真腊（柬埔寨）、马来半岛的满刺加（马六甲）、暹罗以及越南等地，这一时期都有华侨在那里从事商业贸易活动。13 世纪末期元朝政府曾派周达观出使柬埔寨，他于 1267 年回国后，写了《真腊风土记》这本闻名的著作。书中“流寓”、“人物”、“贸易”等条记述了华侨的不少情况。书中记载“唐人之为水手者，利其国中，不着衣裳，且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屋室易办，器用

易足，买卖易为，往往皆逃于彼”。这说明当时在柬埔寨谋生比国内容易，中国人前往定居者不在少数。“唐人到彼，必先纳一妇人者，兼亦利其能买卖故也。……见唐人颇加敬畏，呼之为佛，见则伏地顶礼；近亦有脱骗欺负唐人，由去人之多故也”。可见元代在柬埔寨经营买卖的华侨，与当地妇女通婚已是很普通的事，华侨与当地人民有着良好的关系，很受尊重，而到柬埔寨谋生的华侨，则不断增多。到了明代，柬埔寨的华侨已有专门的集中居住区，《东西洋考》卷三记载 柬埔寨‘以木为城，是华人客寓处’。

元明时期，移居到暹罗（泰国）的华侨也不少。元代与暹罗国互通使节多次，13 世纪末曾有中国制陶工匠应邀到暹罗国传授制陶技术，开创了泰国著名的宋胶洛瓷器。明代移居暹罗的中国人多为商人。据福建莆田县城关口林氏族谱记载，早在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 年）时，他们的先人已到暹罗经商谋生，16 世纪前期，华侨在暹罗已有专门的居住地，“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国无姓氏，华人流寓者始从本姓，一再传亦亡矣”<sup>27</sup>，说明定居在当地的华侨已有好几代并逐渐同化于当地人，因为暹罗人是到 20 世纪才使用姓氏的。而暹罗南部的贸易港口北大年，由于中国商人往来的频繁，以至出现“华人流寓甚多，趾相踵也”的盛况。甚至暹罗派往明朝的使节中，有好几起也是华侨充任的，如 1477 年（明宪宗成化十三年）暹罗赴华使者美亚，就是福建汀州人谢文彬，他是因为贩盐下海，随大风飘到暹罗去的商人，后来在暹罗官至岳坤（相当于学士）。

在马来半岛，龙牙门已是“男女兼中国人居之”<sup>28</sup>，满刺加（马六甲）是中西交通的要冲，这里的居民“身体黝黑，间有白者，唐人种也”<sup>29</sup>，华侨移居这里已历数年，才有可能出现“唐人种”，《闽都别记》也记载了华侨与马六甲妇女通婚的情况：“明永乐时，福州商人赴麻喇国，有姓阮芮朴樊郝，往麻喇国多年，娶番妇生子”<sup>30</sup>。

明朝初年，还有大量征战的中国士兵留居越南北部从事农业、

矿业开采和采集珠贝，他们是这一时期越南华侨的组成部分。

菲律宾群岛上的国家，早在宋代已与我国有了密切的通商贸易关系，到元明时代，中国闽粤商人、渔民经常往来于菲律宾群岛与泉州、广州之间，并开始定居当地。据记载，元末明初已有福建人林旺等到菲律宾传授耕种和造酒的技术，1406~1417年间，郑和曾至吕宋、岷罗洛与苏禄等地，随之中国人移居菲律宾逐渐增多，《明史》记载“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者数万，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sup>31</sup>。据福建华侨史调查资料，1368年（明太祖元年）时福建福清人已移居到菲律宾，晋江县的陈、柯、蔡、吴、许、李、王等姓氏族谱，也都记载了他们的先人在明代移居吕宋的事实<sup>32</sup>。

总之，在16世纪中期（明代中期嘉靖年间）以前，华侨已在南洋各地出现，他们大多数是移居国外谋生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居住地大都是海上交通及贸易比较发达的港口及其附近地方。

#### 四、华侨的初步发展时期（明朝中期至鸦片战争）

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近300年间，是华侨出国人数显著增加，华侨活动区域进一步扩大的时期，华侨在国外有了初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国内的封建压迫和剥削日益严重，大量农民在封建地租、徭役、赋税以及高利贷的榨取下纷纷破产，为了寻求生活出路，他们往往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或者跑到边远地区去垦荒，或者变成“流民”，到处流离迁徙。东南沿海特别是闽粤两省的劳动人民，则利用地理条件之便，或渡海移民台湾，或冒险出洋，“流离”到了海外谋生。这一时期，还经历了满清入关和反抗满清统治的长期战争，也使不少中国人避居国外。以上是这一时期华侨显著增多的根本原因。

这一时期，也正是欧洲殖民者相继东来、东南亚国家开始丧失独立遭受殖民奴役的时期。自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入马六甲

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接踵而至，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相继成立，它们又争夺、又勾结，终于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1521年，西班牙人占有菲律宾，到16世纪70年代，西班牙已确立了对菲律宾的统治；17世纪前半期，荷兰已逐步树立对爪哇的统治；18~19世纪，英国已确立了对马来亚等地的统治。这些正在进行血腥的原始积累的欧洲侵略者，为了动夺东方的富源，开发殖民地的资源，并为他们提供各项生活服务，大量使用廉价而又具有生产技能的中国劳动力，欢迎中国移民前往，甚至用武装抢劫的手段，把中国沿海的青壮劳动力弄到南洋各殖民地从事繁重劳动。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这一时期华侨显著增加，华侨社会开始形成。可以说，海外华侨社会的形成是与欧洲殖民者的东侵同时开始的，而且华侨社会也是同在殖民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双重压迫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这一时期，随着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私人海外贸易不仅屡禁不止，而且出洋经商者的队伍逐渐扩大。明代嘉靖年间倭寇之乱虽经过15年之久得以平定，但海寇中曾有数万名漳泉走私力量这一事实也使明朝统治者深感忧虑，加之平定倭患的巨额耗费造成财政的沉重负担，补充财源已成燃眉之急，这就迫使明朝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部分开放海禁问题。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终于采纳了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奏请，同意在福建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贸易。这不仅使私人海外贸易迅速地发展起来，对于明代后期沿海人民出国经商然后移居海外也有重要意义，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农民能搭乘海外贸易船移居南洋和日本等地。所以，明朝后期，政府部分开放海禁的政策也是这一时期海外华侨人数增多的原因之一。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出国的华侨又有以下特点：第一，多数是到海外去寻求生活出路的劳动人民，特别是沿海贫苦农民；同时由于国内新旧封建王朝的交替，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避难者和商人在出国华侨中仍占有相当比重。这一时期出国华

侨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前一时期。到鸦片战争前夕，分布于南洋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华侨至少有 100 余万。第二，由于欧洲殖民者东来后对华侨的奴役、压制和剥削，华侨原有的地位和作用开始变化。一方面，华侨中单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数量迅速增长，华侨工人在华侨人口中所占比例愈来愈大；另一方面，华侨在英荷殖民主义两个“公司”打击下，18 世纪中叶以后，其经济活动已开始由独立的地位变为中介人的地位。第三，由于华侨遭受到殖民主义者的屠戮和迫害，在迁移地区的选择上，便逐渐由当时已为侵略者所强占的地方（如爪哇、菲律宾）转向侵略者势力暂时还达不到的地域（如暹罗国、加里曼丹），华侨分布更为广泛。第四，东南亚地区交通贸易大港或者中小城镇，已成为华侨集中之地，而且普遍出现了华人居住区，初步形成了华侨社会。

爪哇岛是华侨比较集中的地区，如前所述，在荷兰殖民者 1595 年入侵以前，已有中国人长期在岛上生活，16 世纪末 华侨以爪哇的万丹（下港）、北加浪岸（蒲家龙）、杜并为侨居的中心地，从事于胡椒的收购和买卖，砂糖制造，以及胡椒、稻米的栽培。1619 年，荷兰殖民者开始营建巴达维亚，强行掳掠华人移住，以从事各种劳动。明清王朝交替之际，曾有许多华南人民到爪哇避难，尤其是跟随郑成功的抗清官兵，在台湾归顺清朝时，很多人远徙南洋一带。据说仅爪哇一地，华侨人数就增加了 50 000 人以上<sup>33</sup>。到 18 世纪初叶，华侨不仅在商业方面，而且在经营制糖业、酿酒业方面也有一定的力量。到 1710 年，仅在巴达维亚一地就有中国人开设的糖厂 130 家。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巴达维亚城内已有华侨 60 000，市外 40 000<sup>34</sup>。到 1733 年，城内有华侨 80 000 人，而且日益成为发展当地经济的主力。荷兰殖民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对力量强大起来的华侨采取各种压制、迫害的措施，到 1740 年 10 月，荷兰殖民者终于举起屠刀，罗织罪名，在巴达维亚残酷屠杀中国居民，使华侨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死者达 10 000 多人，酿成了骇人听闻的大血案——红溪惨案。事件

发生后，荷兰殖民者深恐当时的清朝政府问罪，曾遣使奉书谢罪，但当时的乾隆皇帝却回答说：“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云”。足见封建王朝对华侨采取的敌视态度。

在婆罗洲地区，17 世纪初年，华侨便已大量地出现在加里曼丹。18 世纪初，华侨在婆罗洲介绍和推动胡椒的种植，也收购当地居民生产的胡椒，并贩卖供应当地人民的生活日用品。1707 年，马辰华侨与当地人民 3 000 人联合一致，曾共同抗击了英国殖民者的入侵，这时已有华侨在马辰、三发、喃吧哇等处居住。18 世纪中期，自西加里曼丹发现金矿后，一直由华侨工人从事开采，相继成立的许多华侨“公司”，例如和顺公司、兰芳公司、霖田公司等，就是华侨用来承担开采的一种经济组合或者社团组织，同时也是一种自卫的宗派组织。以坤甸为中心地的兰芳公司，是广东梅县人罗芳伯于 1777 年建立，最盛时曾拥有三四万华侨工人，不仅开金矿，而且从事于农业、林业、贸易、畜牧以及造船、筑路等经济活动。随着公司组织的发展，西加里曼丹的华侨迅速增加，到 1823 年荷兰殖民者在加里曼丹站稳脚跟为止，中国移民每年常在 3 000 以上，到 19 世纪 20 年代，加里曼丹的华侨已达 150 000 人左右，其中 90 000 人在西部金矿地区，多数为客家人。

马来亚半岛上，马六甲早已是华侨集中之地，1641 年已达 1 000 多人。在鸦片战争前，华侨又逐渐分布到槟榔屿、森美兰、彭亨、雪兰莪等地，主要为开锡矿、种香料的工人。到 19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这些地区的华侨采锡工人达几万人之多。槟榔屿在这一时期也成为华侨集中的地区，1786 年英国殖民者正式侵夺槟榔屿后，大量招引华侨从事开垦，全岛人口骤增，1788 年时，华侨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2/5 以上，到 1804 年（嘉庆九年）华侨发展到 12 000 余人。新加坡一度曾是华侨商人云集之地，后来由于战乱，在 14 世纪初叶已成荒岛，居民很少，据记载，1819 年英国殖民者踏上新加坡岛时，这里只有 150 个居民，其中 30 名是华侨，由于殖民者不断招引华工进行开发建设，到 1820 年时，该岛人口

已达到一二万人，中国人成了该岛主要居民。

暹罗的华侨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公元 1602 年随荷兰船到过北大年的英国人史密斯，曾记载了这里诸番邦朝宗女王，举行盛大庆典时，华侨商人出钱演戏助兴的事情。17 世纪末，大城已有华侨“特别居住区”定居在暹罗的华侨 3 000 余人。18 世纪以来，中暹贸易极为频繁，每年从潮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开往暹罗的商船五六十艘，随船搭载不少移民；另外，也有中国人从云南边境移居泰国北部地区。1767 年，暹罗、缅甸发生战争，缅军攻入暹罗首都大城，华裔郑昭率领华侨和暹罗人民奋起抗击，最后打退入侵者重新统一暹罗，郑昭立为国王。郑昭在位时，中国潮汕一带农民大批渡海到暹罗，到却克里王朝，更形成了移民的浪潮。清代嘉庆年间，外国传教士记载暹罗的情况说：“华人驻此，娶番女唐人之数，多于土蕃，唯潮州人，为官属封爵，理国政掌财赋”<sup>35</sup>。到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估计华侨人数达到 450 000 人左右，占全暹罗人口的 16%，甚至也有人估计暹罗华侨达 800 000 人左右<sup>36</sup>。大量中国人移居暹罗除经商者外，大部分从事甘蔗、胡椒、槟榔的生产，暹罗的甘蔗就是在 1810 年左右由华侨传入的。还有的华侨在暹罗从事建筑、挖掘运河等劳动。这一时期，曾出现了开发泰国南部宋卡的著名华侨人物吴阳，开发麟郎的许泗漳，许曾被泰皇封为麟朗（拉郎府）大郡侯。

中国和缅甸山水相连，中国人很早就经过云南由陆路通道入缅经商。明代，缅甸已有不少华侨。明末清初，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桂王）逃到缅甸，跟随他的部分官兵后来就在上缅甸定居下来，其后裔自称桂家。清初，云南人宫里雁在波隆开采银矿，华侨矿工达到万余人。到乾隆初年，缅北一带的华侨吴尚贤开设茂隆银厂，周彦青开设石牛银厂，规模都很大，有华工数万人。这一时期侨居缅北经商的中国人也不少，19 世纪中期，仅侨居八莫一地的中国商人就有 500 名，他们主要经营棉花贸易，设有巨大的货栈。19 世纪中叶以后，经过 3 次英缅战争，英国殖民

者确立了对缅甸的统治，需要劳动力从事开发，中国人才开始大批地从海路移民到缅甸。

明末清初，越南华侨的数量也有了显著增加。原因之一是许多“义不臣清”的中国人移居到越南境内。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原明朝龙门（今钦州）总兵杨彦迪和副将黄进以及雷廉总兵陈尚川等，率领士兵3000人，来到岷港。那时候，湄公河三角洲还是一片荒原，统治越南南方的广南王阮福濒正患人力不足，“无暇经营”，于是就安置他们去那里从事开垦。他们在嘉定（西贡）、定祥（美荻）、边和一带，开荒辟田，修建村庄，还建设起城镇，发展商业，使湄公河三角洲繁荣起来。现在的越南南方河仙一带，也有大量中国移民在那里从事开发，1798年，广东雷州人莫久带领1000余人到了河仙省，在沿海荒凉地带聚众开垦，建立河仙城，成为南圻重要港口。在莫氏父子开辟河仙期间，中国人移居到南圻一带的人数大增，正是由于华侨与当地人民共同辛勤开垦，经数代人努力，才使旷古荒原变成了“海外乐园”——南圻重镇。

华侨矿工的增加，是这一时期越南华侨显著增多的另一原因。越南北部的一些矿区，包括金、银、铜、锡各矿，多募“清人”采掘，有时一矿“至以万计”，来自广东潮州、韶州的移民尤多。除华侨矿工以外，在越南经商的华侨也不断增加，当时南方的对外贸易主要港口会安，已有福建人为主的唐人街，华侨商贾云集，据称1768年时这一城市有华侨6000人<sup>37</sup>。18世纪70~80年代，华侨的活动还使一些村庄形成了堤岸这一著名的华人城市。1782年，越南阮文岳的西山军在堤岸及西贡两地大肆屠杀华侨，死者达到11000人<sup>38</sup>。可见当时已有大量华侨居住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带。

自从西班牙殖民者侵入菲律宾后，华侨就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剥削。1571年西班牙人初占马尼拉时，这里已有华侨150人，到1593年，马尼拉华侨已达10000名，1603年，菲律宾群岛上的华侨增加到30000人左右。华侨从事经商和各种手工业劳动、重体